

“请给我画两只白头翁，好吗？”

——巴黎漫游记

饶平如

饶平如称自己的经历是“木偶奇遇记”。一本写于近九十岁，记录自己和老伴美棠故事，本无示人的小书《平如美棠》，于2013年出版后持续畅销；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其中的深情感动了无数人。今年初，该书出版法文版（见下二图），95岁高龄的作者应邀赴法，作了巴黎七日行。回来后，老爷爷以和老朋友交谈的笔触，细细记录了这些天的经历和见闻。笔会摘录刊出。

——编者



此消磨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家史，留给子孙们看看也好。我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并不想公诸于众，只因偶然的机缘，媒体知道了，前来采访，出版社知道了，前来商洽出版成一本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我是‘木偶奇遇记’，我天生木讷，不善交际，为什么人们爱看这本书？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认为这是个奇遇罢了……”又有某杂志的女士提出：“您是否可以给我们法国青年写几句话？”我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贵国的传统文化有些不大相同，但您既然要我写，我就照样写我赠中国朋友的那四十八个字。”它们是：

人生苦短，青春难再。莫负初衷，相敬相爱。
凡事包容，凡事期待。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白头到老，幸福愉快。地久天长，真情永在。
她收起了这张纸条，我们拍照之后，愉快地离开了。
接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十字报》记者采访，他戴着眼镜，除了老问题，

又提了几个新问题：“你们那个年代的订婚方式，现在还存在吗？”“您认为哪一种比较好？”我说：“现在老式的父母之命的订婚方式已经没有了，以我而言，我的五个孩子的婚姻都是他们自己做主，我从未过问。当然以现在的方式为佳，世界文明在进步嘛！不过，在网上谈论婚姻大事，固然快捷，但也不妨征求一下父母的看法，毕竟父母冷静而客观，这样的婚姻才稳妥些。”

下午三时，安来了，接我们到她所在的瑟伊出版社——据说是法国五大出版社之一。到了一所高楼大厦，该社占有一层楼面。走廊上陈列着二十余本新书，墙上陈列着各国作家的照片，莫言的照片也在其中。我们在一间会议室和社里的编辑们见面，我拿出漫画原稿，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我俩的故事》的成书过程。参加见面会的编辑们都拿着一本法文版《平如美棠》，让我签名留念……出来后，已是晚饭时间。尚多礼先生请我们到另一家餐馆，他们仍是葡萄酒，我喝茶，又替我点了一盘三文鱼，这回是熟的，可以吃。尚多礼还介绍一样好菜，说是用大葱葱的，如何如何可口，于是大家都来一份。不料端上来的，是每人一钵用奶酪烧的，加上其他像肉丁似的东西的一种羹，他们法国朋友不可一匙地往嘴里送，看起来其味妙不可言。可是我一尝之下，实在难以下咽，奶酪据说营养价值极高，但其味道对我来说很不适应。在此情况下，我为了维持礼貌和尊重主人起见，也只好克服困难，勉强灌入腹中，大约吃了四分之三，方才停止，说饱了，未露出破绽。

1月25日（周三），晴。

午后，安和依兰姆加上我和希曾四人，驱车到法国广播电视台大厦。该处是圆形建筑，中间是办公处，四周都是一间一间的广播室。在广播电视台需要同声口译，请了一位中国年轻女生，姓陈。我们一进门，里面有两间，前面一间为机组人员在调弄着各种仪器，安和希曾都停留在此，只有我和那位陈小姐方可进入里面。那位女主持人年约三十余岁，似乎是资深之辈，指挥着陈小姐坐在她与我中间，最后，她数着“五、四、三、二、一”开始向我发问了。我听力本来有些下降，幸亏陈的北京话标准，加上口齿清晰，问的无非是美棠和我有关恋爱及婚姻问题，所以也得以顺利过关。最后，她要我吹奏口琴，我老调重弹，仍吹《花好月圆》，何难之有？吹毕，时间已到，圆满结束，录毕出来，又来到另一间。先在休息室稍候。我座位旁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穿戴整齐，她一开口，使我大吃一惊，比我这个说南腔北调的中国人要标准得多。我问她“是不是中国人？”她说：“不是，我是法国人。”原来是请来的嘉宾。不一会，进入演播室。室内一张方桌，墙上有着“France inter”字样，主持人非常时尚，是位金发女郎，她左方是那位汉语很好的女嘉宾，右方是小陈和我。希曾等人在另一间仪器室可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一次，演播的方式与上一场有所不同。主持人问我一个问题，经小陈口译后，我即回答。然后，主持人就和那位女嘉宾叽哩呱啦互相讨论着，似乎在议论些什么。讨论完，主持人又问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之后，她俩又开始讨论……我估计她们是在把我们俩的故事在和法国的青年恋爱婚姻情况作对比或评论。到了最后，主持人向我说：“你能唱《魂断蓝桥》这首歌吗？”我说：“能。”这首歌本是F调，我为了不走音，故意放低了两个调，而且平心静气，用低沉的声调唱完全曲。好，时间到。我抱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方针，只希望不要出丑，但求无过。归来时我在车中问希曾：“可以及格吗？”希曾说：“可打80分。”我闻此言，也就放心了。

此时，大约是下午三点多，车子直奔凤凰书店。一进店门，就看见右侧已有读者四十余人坐好位子等候。我赶紧向观众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歉意。因为我迟到了。观众中有法国人，多数为老年人，华人中则多为年轻女孩。有一位华人男青年问：“我父亲是个导演，想把此故事拍成电影，您看男女主角由何人担当最为合适？”我只能回答：“拍成电影我没有意见，至于男主角的问题，我看最好让导演去决定吧。”又有人问：“您妈妈平时是如何教育您的？”我看此人是个华人女青年，像她这样年龄的尚有十多岁，我想何不讲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给她们呢？于是我就说：“我妈妈会做诗，写字，还会教我吟唐诗《枫桥夜泊》……”杜方媛听到这里，忙说：“这句话我没办法译，什么叫‘吟’？”我解释：“从前的中国文人欣赏古典诗词不是用‘朗诵’的方法，而是用‘吟’的方法，因为古典诗词是韵文，要使它‘音乐化’，‘吟’就能使诗词除了产生文学之美，还能产生音韵之美。”于是，我就吟了这首诗。吟毕，大家鼓掌——我相信大多数人只在书本上看见有“吟诗作赋”这个词，但是怎么去“吟”，恐怕很少人听说过。提问毕，开始签名，我发现，很多法国读者要求我写他（她）的中国名字，如雷塘、司墨、杰奎林、白纳德、福金、福盈……这些名字多是他们法文名字的谐音。我猜想这些读者一定对汉语有兴趣，有的或者正在学习汉语……

1月27日（周五），晴。今天是我国农历除夕。

之后，我们走出所住的宾馆，信步来到附近的“书市”。这是临时搭建的地方。只见许多大小不一的书摊子，都在卖书——主要卖漫画书。有些漫画家就坐在里面为自己的书签名。我们走到一个摊位，摊主是个女士。她的摊子上有售法文版的《平如美棠》，摊前已有二十余人排队。杜方媛和我挤入摊内，各坐一只小圆凳。我开始签名。

签名结束后，我们乘出租车至火车站，乘火车返回巴黎。晚餐后，我们又来到一家法国人开的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读者全是法国中老年人，女性较多，约二三十人。店主先作了介绍工作，然后读者提问，多半是老问题。但当有人问我怎样学画时，我却作了较详细的答复。我说以前学的是丰子恺先生的画，因为他的画使用毛笔，画面虽简单单笔，但却有诗意，有丰富的内涵。近来，我又在学桑贝先生的画（注：桑贝是法国当代著名漫画家），因为他的画都具有时代气息，而且能以简单的笔触表达出复杂的事物。我曾买了四本他的画册……说话时我未在意，不料在签名时，店主忽然拿了一本法文版《平如美棠》，说：“请您写：‘送给桑贝先生’，再签个名。我认得他，给他送去，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照办了。果然，不久店主就拎着一个纸袋给我，里面有两本画册，是桑贝先生回赠给我的。一本是《一点巴黎》的袖珍本，另一本是他的新作：《桑贝在纽约》——这是意外的收获！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对法国读者说：“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理想、最成功、最美满的婚姻是‘白头到老’。我们对一对年轻新婚夫妇的祝福，最常用的就是这句话。我国有一种鸟，头顶上生着一撮白色的毛，称为‘白头翁’。为了增加吉祥的气氛，我们还要把两只白头翁画上去……”到了排队签名时，有位法国老太太就对我说：“您给我画两只白头翁，好吗？”我欣然同意，就在她的书的扉页上画了一只白头翁站在树上，题词“白头到老”四个字，然后签名。她非常高兴，连声道谢。像她这样要求画白头翁的有五六位，其中，安的女儿也来了，也要我画。我由此感悟到，所谓“浪漫”，那只是年轻人的事，人到老年，在经过成熟、沧桑、见识、自由（指时间）等阶段之后，还是希望夫妻二人相守到白头，安静地享受晚年幸福，这是人类的天性……结束了这次见面会，已经很晚，但我觉得高兴，和法国朋友作了一次文化交流，我今年的“除夕”虽然不在家里过，但在异国他乡也过得颇有意义。

1月29日（周日），晴。

六时许，整理行装。晚上就要启程回国。在房中休息，回忆此行究竟学到了什么？学到四句法语：“您好”叫“帮祖”（据说还有一种叫法，但只限于亲密之人使用，一般人不宜用），“再见”叫“阿屋瓦”。英语的“yes”，法语叫“唯”，英语的“No”法语叫“诺”。我们所住的酒店“Aiglon”，我问过杜方媛，他说乃“雏鹰”之意。

1月30日（周一），晴，农历初三。

在航班上醒来时，乘务员送来热毛巾擦脸。早餐吃粥。中饭供应是鱼、米饭。下午2时30分到达浦东机场，平安顺利地回来了。由次孙超超驾车，回到航华老家。下午5时晚饭后，回来一切觉得舒适，睡在自己的床上，万分满意。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此言不假也。

（2017年2月20日写毕）

圣卢西亚：经济学与诗歌

蔡天新

在他写的戏里扮演过角色。出人意料的是，当年秋天，沃尔科特便因他的诗“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久，我也收到那年由上海诗人陈东东编辑的《南方诗志》秋季号，内有香港诗人黄灿然翻译的沃尔科特的七首诗和写作年表，其中一首《仲夏，多巴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两小节是：

我拥有的日子
我失去的日子
像女儿那样，
从我这庇护的双臂里
远走高飞的日子

多巴哥岛，那正是另一个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组成部分。沃尔科特的前三部诗集分别出版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顿和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而前两部副作均出版于布里奇顿，以后无论是诗还是剧本便是在伦敦或纽约出版了。

1930年，沃尔科特出生在圣卢西亚首都卡斯特里，拥有非洲、荷兰和英国血统，祖母和外祖母均为黑奴，因此他的皮肤是棕色而非黑色。他在圣卢西亚长大，后来上了圣玛丽学院，继而到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念书。毕业后他在金斯顿的牙买加学院教过书，也在报社当过记者，然后他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美国的波士顿大学。退休后，沃尔科特返回故乡，在他的垂暮之年，我的一位洛杉矶诗友曾去探望。而我本人主编的《现代诗110首》（三联书店）和《漫游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里，也收录沃尔科特的多首诗歌。

令人惊奇的是，我后来发现，在沃尔科特之前，圣卢西亚岛竟然还诞生过一位黑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名字叫做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年，刘易斯出生在卡斯特里，他的双亲是来自安提瓜岛的移民，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的老四，七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刘易斯是个聪明的孩子，跳了两级，后来留学英国，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式，那是一种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也被称为“刘易斯模式”。他认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一种是仅能糊口、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自给农业结构”；另一种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结构”。其中前一种存在低到零甚至负数生产率的“过剩生产力”，后一种明显高出。

刘易斯是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讲师时提出上述模式的，成名以后曼大校园里有一幢大楼以他的名字命名。1957年，加纳共和国独立后聘请刘易斯担任首席经济顾问，他帮助这个西非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刘易斯被任命为加勒比海诸多联合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并在1963年被英国女王封爵。同年，刘易斯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杰出教授，在那里生活了24年。

1979年，正是刘易斯的祖国圣卢西亚独立的年份，他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迄今黑人中唯一一位非和平奖和文学奖得主（和平奖已有十位，三位文学奖得主是索因卡、沃尔科特和莫里森）。1986年，刘易斯从普林斯顿退休，住到巴巴多斯岛上，就在西印度群岛大学凯文希尔校园附近，在那里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1991年，刘易斯在布里奇顿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故乡圣卢西亚安葬，他的铜像与诗人沃尔科特的铜像并列在卡斯特的街心花园里。

我想起20世纪美国大诗人埃兹拉·庞德，他不仅发表过有见地的经济学论文，还在诗歌中广泛应用，尤其是晚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完成的巨著《诗章》。庞德对普遍意义上违反自然的高利贷进行了抨击，同时又对国家控制信贷体系表示赞赏。大不列颠岛上的批评家康诺利曾这样调侃，“《诗章》里的气候很像我们英国，大部分时间里都刮着一股夹着雨意的西南风，有时转多雾——经济学论文的雾，偶尔会露出几抹地中海灿烂的阳光。”

3月17日，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卢西亚诗人兼剧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沃尔科特曾被另一位诺贝尔桂冠诗人、俄国出生的布罗茨基赞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个人认为，他是罕见的能被大众阅读认识的史诗诗人。在他之后，在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已没有纯粹的诗人，换句话说，均是以小说或其他文体得奖的。巧合的是，我最近刚好对圣卢西亚这座仅有18万人口的加勒比海小岛产生了兴趣。

圣卢西亚位于加勒比海向风群岛中部，北邻马提尼克39公里，西南距圣文森特34公里。面积616平方公里，是群岛中的第二大岛。虽然也是火山岛，但并不活跃，最近一次喷发是在1766年。哥伦布四次航海均未抵达圣卢西亚，无人知晓欧洲人发现该岛的确切时间，只能推测在1500年前后，至少1520年梵蒂冈制作的地球仪上已经有了圣卢西亚。

与邻近的其他岛国一样，圣卢西亚经过了英国、法国的轮换殖民统治，最后在1979年获得独立，同时加入了英联邦。虽说英语是官方语言，但岛上的人主要还是说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起源于殖民化和贩卖黑奴初期，它的词汇是英语（或法语、荷兰语），却用非洲语言的句法。数个世纪以后，它已变成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由此也催生独特的音乐、舞蹈和风俗。

我第一次听说圣卢西亚是在1992年夏末，来自美国一所姐妹大学的一伙交换生来到杭州，因为第二年我要去他们学校访问，学校外事处老师便介绍我与他们认识，其中一位黑人女生叫维罗妮卡来自圣卢西亚。当她知道我是诗人以后，告诉我她认识故乡的大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她还曾

去年10月中，我得到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通知，拙著《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已由法国瑟伊出版社译成法文版。该社拟邀请我前往巴黎在著名的华文书店（凤凰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又说，法国安吉兰漫画节将于2017年1月26日至29日举行。这是一个著名且历史悠久的漫画与绘本展，该展览负责人也希望我能去，并祝我幸福长寿。我可以由一名家属陪同，法国方面也会有翻译及陪同人员。时间是1月23日从上海出发，28日由巴黎返回。一切费用，均由他们料理。

我考虑了一番，目前身体尚属稳定，也想借此机会，出国去看一看。

1月24日（周二），晴。

和我们同住一酒店的是法国人杜方媛先生，《平如美棠》的法语版译者。以前，我根据他的姓名及联系时他流畅的中文，误猜他也许是我国台湾人。没料到他是地道的法国人，原来他与另一位中国女同学（云南人）恋爱，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刚三个月）。难怪中文水平提高很快。我们三人一同吃早餐。自助餐我选一种小圆形面包，较软，法国的棍状面包据说有名气，但我吃不动，太硬。十时许，杜方媛告知，有客来访。来访者是一位记者，瘦长个子，所问的问题大致有：“您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您写书时有写作提纲吗？”“您学过画图吗？”“您怎么对一些细节记忆得如此清楚？”“您是先写文字后插图还是先画好图再写文字？”“您写完这本书之后的心情与以前有何不同？”“大多国内媒体也问过，比较好回答。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漫画家，仅仅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退休老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本书。只是因为老伴去世，我内心难过，日子很苦闷。别人借酒消愁，抽烟解闷，我是不喝酒不抽烟的人，后来我就想，何不把我与老伴二人过去的经历和美好的回忆写下来，画下来，一方面借



《平如美棠》内页



饶平如先生在法国

好作者和好读者

止庵

我的《相忘书》出版在十年前，此番重新印行，订正了一些写错或印错的字，再就是将插图尽皆删去。——关于这本书，所要讲的就是这些，以下都是闲话。《相忘书》之前，我出过随笔集《樗下随笔》《如面谈》《六丑笔记》《洁韵集》《向隅编》《罔两编》，之后则有《云集》《茶店说书》《比竹小品》《旦暮帖》和《风月好谈》，绝大部分都是读书之作。我谈到不少读过的书，还有更多读过的书没有谈到，但相比之下，恐怕读书的方法要比具体读哪一本书更重要，虽然这方法就体现在读某一本书之中，而离开所读的书，所谓方法也就成了“屠龙之技”。

前些天偶尔到豆瓣网看看，在微薄上写了一段话：“只有你是个好读者，我才是个好作者；即使我不是个好作者，你仍然可以是个好读者。”这可以说是我对自己的读者的期待，当然更是对自己作为读者的要求。我一向以为，没有做好必要准备的阅读，就是对所读的那本书来说，或许是个灾难。

虽然，认字就是一种阅读准备，不过我想说的是，经验，兴趣，耐性，好奇心，理解力，等等。有些准备，甚至是专门针对某一本书的。讲得更具体一点，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不是这本书的缺点，而是它的特点，甚至优点；抑或反之，它并不是优点、特点，而是缺点。举个例子，我在出版社工作时，曾打算找人翻译本雅明的《拱廊街》，遗憾没有成功。好在《拱廊街》迟早会被译介过来，但对于这样一部“几乎完全由引文组成”的著作，怎么知道不是“掉书袋”——像不少看不惯作品中夹杂引文的读者

常常抱怨的那样——而是作者的精心追求，也是作品的特色所在呢。我所希望的是，一方面，作者写书的苦心，能为读者所领会；另一方面，读者读书，真能得到一本书的好处。这未免大过理想化，但也可以说是很“经济”，我从未做过自己的买卖，不过好歹在外企打过十几年工，训练出凡事都要考虑效益的思路，我想读书亦当如此。自然，有人不在乎这个，也无所谓。总而言之，自己感不感兴趣是一回事，人家写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至于自己看不懂，就认为人家写得不好，则更等而下之了。

伍尔夫说：“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见，那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读书之道，盖在此矣。与此相反，则有如切尔特著《云图》中所描述的：作家霍金斯遇见一位胡说一气的书评人芬奇爵士，忍无可忍，将其从阳台上扔下活活摔死了。然而作家也未必只想听好话——只有段数不够的作家才行。杰出如契诃夫就说：“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所期待的大概是真正的内行话，读者应该成为作家写作的“解人”。当然要是能够像复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那样别具只眼地解读《青春之歌》《红日》等，就更可佩服。如果前面所言对应着“只有你是个好读者，我才是个好作者”，那么这里就说得上了“即使我不是个好作者，你仍然可以是个好读者”了。